

◎日常人文课

## 王蒙：我特别理解这句话



## “可能性并不排除不可能性”

文学有几大特点，第一，它是来自生活的；第二，它是可以虚构的。虚构的结果就使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似乎不受什么限制。

任何的事情都会考虑到可能性，经商有经商的可能性，考学有考学的可能性，作战有作战的各种可能性。在各种可能性之中，一般的可能性是一个序言，是一个引子，是一个序曲。只有当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以后，这件事情才算是完成了。但是从文学层面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你把各种可能性都能够设计得，构想得，分析得，安排得清清楚楚，动人心弦，你这个差不多就算完成了。

可能性是一个哲学上最有趣的问题，因为可能性包含各种方法、预测，这是一种可能性；含蓄、保密、不透露，这也是一种可能性。而且请大家想一想，可能性是不排他的，可能性并不排除不可能性。

文学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，必须通过语言，必须通过文字，因此语言和文字太复杂。

对于可能性的部分是对想象和创造的重视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。语言本身又出现了不知多少可能性。

我常常说（但我说的很可能仍然是不准确的），任何一句话都至少有15种的说法。说各位好，这是一种说法；大家好，这是一种说法；说Hello everybody，这也是一种说法。各种说法很多，但是作为文学来说，要能在哪里找到相对最精确、最合适、最动人、最有活力的说法。

## “文学是艺术的硬通货”

我还喜欢说一句话，就是文学是艺术的硬通货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舞蹈、美术、建筑，这都是视觉的艺术。但是如果你想明白它们，你需要用语言，你需要有一个说明书，或者需要有一个介绍。这就是说，你

要借助语言和文字。

音乐、歌唱，很多东西是生活的艺术，是听觉的艺术。（比如）你要想普及交响乐，我们一定有一部分人听交响乐，听不明白。要给他们普及交响乐的话，你得给他解释几句，你得把艺术最微妙的感觉、艺术最动人的感觉表达出来。

如果你能够用语言来讲一段对交响乐的理解，就相当于文学，你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语言表达意义的水准。所以我们重视语言，重视文学，重视文学的可能性，重视语言的可能性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

## “文学才是世界的本质”

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的大家，文化的大家，在古代文学有各种说法，也表达了文学本身的各式各样的可能性。

博尔赫斯说的世界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通向一本一本的书。世界之所以可爱，是这个世界给你提供了一个任务，把世界这本书编辑起来，把它符号化，把它段落化，把它章节化。博尔赫斯说的是什么？他说世界的本质并不是它的形状、形体和目的，而是它是章节，它是段落，它是结构，它是文学，就是说文学才是世界的本质。

文学的本质，文学的本体是这个世界，文学的源泉是来自于生活。这是我们的看法，但是博尔赫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，很简单，他被文学和语言的艺术俘虏了。

一个人要钻了艺术那是不得了。钻了艺术以后，你一切的痛苦都没有了，或者说你一切的痛苦全部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已经钻了艺术。

西方的作家写这个（主题）写得最好玩的，写得真正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英国人毛姆。毛姆写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，他写法国一个真实存在的大画家高更。这高更本来是银行的一个职员，已经40岁左右了，忽然有两年他表现得不太正常，下了班也

2024年11月6日下午，嘉兴大学的“省身讲堂”现场，坐满了人。

来自上海、衢州、湖州等周边地区和嘉兴的作家、文学爱好者们以及嘉大学子汇聚一堂，聆听“人民艺术家”王蒙开讲“文学的可能性”。

今年90岁的王蒙，从事文学创作七十余年，出版了百余部小说、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。

之前在谈到自己时，王蒙爱说一句话：我还是文学战线上的“一线劳动力”。

有人说，如果我们打开王蒙的作品库，会发现“时代”是最为耀眼的关键词。

1953年深秋，19岁的王蒙写下了《青春万岁》，“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”。此后，王蒙风雨兼程的创作就一直包含着对人民和生活的爱。

从《青春万岁》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，到改革开放后的《蝴蝶》《活动变人形》，包括新时代以来的《笑的风》《霞满天》等作品，王蒙为中国留存了丰富的文学档案。

他的长篇小说《这边风景》，以新疆农村为背景，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，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，被誉为“《清明上河图》式民俗画卷”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。《这边风景》的诞生和他的人生经

不回家，每天不知在忙着什么，问他又不说。妻子雇了私人侦探，侦探汇报更高每天都到各个地方去画画、收集材料，他的妻子听到这里就哭了：如果他迷上了艺术，我无法战胜艺术。

他的妻子给了侦探一大笔钱，说给你这个钱的目的，就是要你必须保证不准告诉别人我的丈夫迷上艺术了，不然银行马上就把他开除了，银行谁能用一个迷上艺术的人。如果她让别人知道她迷上艺术了，信用机构马上就他的信用卡吊销了，这样的人买东西还能付钱吗？

毛姆就是用了这样特别夸张的手法，嘲弄的手法，实际上他是在歌颂艺术，歌颂艺术对人的影响，歌颂艺术的魅力，歌颂艺术的精神能力，歌颂艺术对人整个的精神境界的提高，这种影响达到了极致，这也是文学和艺术的一种可能性。

文学可以很含蓄，可以话说得不那么特别清楚，把精神的空间留给读者，但是文学也完全可能把这一切都写到了。

## “因为我别的都没干成”

电影《铁皮鼓》的原著作者君特·格拉斯，他回答法国《世界报》的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写作？他回答说：因为我别的都没干成。我就到处引用这句话，引用这句话的结果就是一部分年轻的写作的同行对我产生了不满，说你怎么带头贬低文学？

我也想了几十年，我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喜欢这句话，直到90岁，我才弄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句话。因为我喜欢这句话的逆推论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是逆推论呢？也许我不是什么事都没干成，才选择了文学，而是因为选择了文学，我也不想其他的事来消耗我的人生。一个人选择了文学，他有很多事就不想做了，但是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我特别理解这句话，反过来说，因为写作了，别

历有关——1963年底，王蒙一家远赴新疆，一去就是十六年，这部小说也是这段经历的收获。

2019年9月，王蒙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中国社会的亲历者，王蒙身上融合了文化部长、基层干部、知识分子作家等多重身份；他同时也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，这些年，他以文学、研究、演讲、访谈等方式不断讲述着当代中国。

在讲座开场，嘉兴市文联名誉主席黄亚洲介绍，王蒙多年前曾路过嘉兴，但是没有停留，但他依然记得作家余华跟他在一起，给他讲起了自己在海盐县怎么给人拔牙的故事。这一次王蒙来到嘉兴，看了南湖和红船，走访了嘉兴的美丽乡村，也因为嘉兴市委宣传部、市文联、市作协的邀请，嘉兴的读者有了这样一次和文学大师近距离交流的机会。

以下为王蒙讲座的部分内容，我们整理如下。

浙江新闻奖社会活动奖  
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

嘉兴市图书馆  
嘉兴日报  
嘉兴市新华书店  
联合主办

的事我就做不成。

## “我下辈子还必须做中国人”

要愿意和人民交流，要多看书，千万别光看手机。

说实话，我看手机的时间也超过了看书的时间，但是我还是说，如果光看手机，你就变成了小傻子。手机上有海量的信息，但很少有人能够来思索、鉴别、选择，相反，如果你去看书的话，我们会进行一个思索、选择。

我是1953年开始写作的，1979年才出书。1979年初到现在是多少年？是46年，我耽误了二十几年，但是现在继续不断写。我写过一篇中篇小说，叫做《从前的初恋》，前年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。小说是我1956年写的，我曾经把它投给刊物，被刊物退回来了，那个时候没有解释，可能写得和生活太近了，让人看的感觉，有点像是报纸上的内容。结果过了这些年以后，这个作品还是受到了《杂志》主编非常大的欣赏。

《这边风景》是（写好）40年以后出版的，称赞它的人，说它是“《清明上河图》式民俗画卷”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，现在正在改编成电视剧。我还有一个作品叫《青春回旋曲》，是经过30年后发表的。

这些作品既有它的时代性，甚至于新闻性，有的（作品）好像是站在风口浪尖上，它可以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在经过几十年以后，仍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，这也是一种接受美学的不同。

诗是美好的。我在《人民政协报》上写过一篇文章，写的是我去开封游览“清明上河园”，那儿有一个歌舞表演，里面第一首诗就是辛弃疾写上元灯节的词（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）。我说他的写得太好了：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我说哪怕只是为了看得懂，欣赏得了这首诗，我下辈子还必须做中国人。

◎枕边书

## 当命运的尘埃已堆积如丘——读《越过山丘》

迈步人生的漫长旅程，我们常会与命运的波澜不期而遇。那些或细微或严峻的挫折与磨难，经时光过滤、沉淀，如尘埃般缓缓堆积，幻化成一座看似难以逾越的山丘。“我要写一本岁月的书，记录我们受过的苦，付出的爱，穿越过黑夜的平凡人生。”资深媒体人邱兵在他的非虚构散文集《越过山丘》中，以朴素而细腻的笔触，将一个个饱含深情的故事娓娓道来，既有普通人陷入失控漩涡后的奋力挣扎与深沉执念，也有他们坦然面对世事无常的豁达与从容，充分展现出个体与时代交织、碰撞的动人片段。

生活从来不是一潭死水，变故总是在不经意间突如其来。作为《东方早报》和《澎湃新闻》的创始人，邱兵亲历了纸媒的由兴盛至落寞，也见证了新媒体的飞速崛起，“突然要和一些写代码的人竞争，终于，还是败下阵来。”在《漫长的告别》一文中，母亲安慰他：“不要急，五十岁的人，还有十年，还能做出件重要的事。”自邱兵有记忆起，母亲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不要活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”这句话成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，引领他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进退，也让他在失意时不至于乱了阵脚。

有家人在的地方，才是故乡。面对母亲已离世的既定事实，邱兵感慨：“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曾经一直认为，母亲和我会有一个漫长的告别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去陪伴、去倾诉、去感恩，然而，事实却不是如此。”而回顾父亲的人生经历，他对这个性格坚毅的老警察充满敬意：“如果说这一生我曾经真的崇拜过一个人的话，只有我的父亲，他用诚实、勇敢、利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。”

书中，他写哥哥的善良、爱猫、爱酒以及酗酒：“如果没有离开，我们一定会再喝一次大酒，喝酒的目的是：劝他少喝点酒。”他写姐姐的美好童年和坎坷过往，“好像有吃不完的苦，从没等到甘来的时候。”姐姐却说：“还记得你讲的人生目标不？做个好人。我想我差不多能完成这个目标，所以我睡得着，吃得香，偶尔跳跳广场舞，完美！”

邱兵的文字风格平实而富有张力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而是以一种近乎质朴的方式去讲述。《小徐，快跑》中的小徐同样是一名资深媒体人，人到中年，丢了工作，跑进大山深处，成为带领村民创收的“鸡王”，“也许他微笑着，也许他仍在挣扎，都不要紧，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在挣扎中求生存，在无人喝彩时埋头向前。”《月亮和三元人民币》中的石总编，饱受病魔摧残以至不能识人，却在清醒的刹那提出对报纸的建议，“人的心脏有两个心房，一个用来笑，一个用来悲，笑的时候，不要笑得厉害，以免触动悲的那一半。”《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》中渴望完美爱情的钱姑娘，终究没有嫁给她的“童安格”，而是陪伴在久病缠身的丈夫身旁，“无论如何，还有光以及善良和爱。”也许它已经不那么耀眼、光芒万丈，但是，它还在，平淡无奇，也抚慰人心。

当命运的尘埃已堆积如丘，我们或许会陷入迷茫与无助。对此，邱兵通过书中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命运的抗争。那些在逆境中努力改变生活的失意者，在困境里不断创新求变的企业家，在岁月无情冲刷下从容老去的长者，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命的坚韧。

山丘的另一面是什么，我们无从知晓。然而，只有越过各自的山丘，才能开启一段全新征程，领略到山丘前方更广阔的天地和更丰富的人生体验。所以，哪怕心怀忐忑、步履踉跄，哪怕有些许辛酸、无奈，也要不断地重整旗鼓。生命因此而热烈真诚。如周国平所言：“当我们越过生活的山丘，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便是生命给予每个人的奖赏。”



《越过山丘》  
邱兵 著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◎刘学正

◎私人书架

## 这座六分仪，见证中西方互动

美国历史学家卫周安的著作《北京的六分仪》，副标题名为“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潮流”。一座仪器，为什么与全球化的中国历史形成了关联呢？

卫周安师从“汉学三杰”之一的史景迁，也擅长用巧妙的微观视角进入大历史的叙事流程。在这部作品中，卫周安以六分仪为切口，以小见大，“消除了一些长期以来受重视的神话。”在传统的叙事之中，古代的中国是一个“封闭”的国家，直至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，迫使闭关锁国的中国开放自己的大门。卫周安显然并不这么认为。

在卫周安看来，自1799年乾隆帝去世到1914年一战爆发的“漫长的19世纪”期间，中西方之间的交互，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西方的输入，而是中国面对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时，基于过往的历史经验，对其进行反馈的复杂相互作用。

这样的历史经验，本身也是相互作用的结果，经验的来源，一方面受传统的、源自本土发展的观念影响；另一方面，则是16到18世纪时期，中国与欧洲文化长期互动的结果。这种历史经验不仅在当时主导了清朝的对外政策，更形成了“西方”一词的概念，这一概念在历经岁

月流转以后，从地理到文化，再从文化到政治，被不断地添加了新的内涵，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认知。

卫周安对“我们为何会产生‘闭关锁国’的刻板印象？”进行了解答。16到18世纪，传教士的活动是中西方交流的途径之一，在这过程中，双方价值观存在很大冲突，或者说，是中国传统的折中性与教会排他性之间的冲突，这种冲突难以从根源上得以解决。同时，西方的政治观点，也难以对中国的上层施加影响力——他们希望获得先进的技术精良的器具，而排斥其中的文化。

该书的标题，得名自南怀仁为康熙所制作的六分仪。怀抱着传教的理想，南怀仁远渡重洋。康熙十二年（公元1673年），南怀仁仿造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设计，为康熙献上他监造的六分仪，这一代表着西方技术的珍宝，希望借此作为叩门砖，让康熙允许传教士在中国活动。尽管南怀仁未能实现意愿，但此举无意中激起了中国高层人士对于西方器具的热衷。

如同欧洲热衷于源自中国的茶叶与瓷器，欧洲的精密商品也吸引着中国精英阶层的注意。例如我国名著《红楼梦》中就有西洋镜、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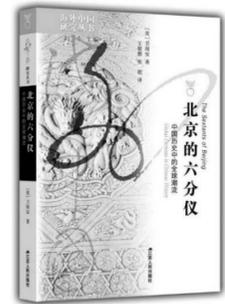
械钟等器具的记述。随着器具的引入，欧洲的科技、文化乃至军事战术，也得以随之传播到了中国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晚清为了自救所展开的洋务运动、向西方派遣外交使臣与留学生等救亡图存的运动，正是这种注意成为了历史的经验，被清朝的高层所吸取的表现。

不过，作者在选取研究对象时，似乎过于重视清朝的上层人士，忽略了底层百姓与欧洲传教士之间的互动。卫周安将其写作的重点，放在了清朝康熙至乾隆这一“中国的盛世”时期，但是，对于作者的磅礴野心与宏大目的而言，仅仅挑选这样一个时间段就够了吗？

明清时期的传教士，走的是“上层路线”，试图通过服务帝国的上层以打开门户。而这导致了作为下层百姓的大多数人出于自保的心理，并不乐于与他们进行接触。此外，传教士对于地方格局产生了新的影响，一方面，建立教堂、吸纳信徒很容易产生土地与赋税上的纠纷；另一方面，旧有的士绅阶层担心这些传教士会与其争夺地方上的特权。尽管传教士承担了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作用，但他们的直接目标是进行传教，扩大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——这带来的冲突并不只有文化

上的对立，也导致现实利益的纠葛。

南怀仁所制造的六分仪，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期间被德军洗劫，运往了柏林，后来在一战后归还，时至今日，依然默默注视着历史的夜空。它见证了数百年间的中西方互动，随着中国的命运与地位共同浮沉。该书结尾说道，“中国的克制与保留并不意味着孤立于世界。”愿未来能像书中所言，“贯穿中国历史的全球潮流，在下一个千年仍将奔腾不息。”



《北京的六分仪：  
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潮流》  
[美]卫周安 著 王敬雅、张歌 译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◎赵昱华